

第一章 明清广西商品经济的历史基础

广西地处五岭之南，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。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土地繁衍生息，开发祖国南部的疆土。如果以柳江人为代表，那么距今五六万年前就有先人在广西活动。及至舜帝“南巡交趾”、“崩于苍梧之野”，^①标志着广西与中原地区已有一定程度的交往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的势力已经到了广西的北部。“战国时期……自荔浦以北为楚，以南为越。”^②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文物，可以肯定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已经传入了广西。如武鸣马头元龙坡发掘了周至春秋时期的墓葬，出土了刀、矛、剑、箭簇、盘、斧、凿等青铜器共 60 件，与中原地区的文物是相似的，同属中原文化系统。^③类似情况，还有恭城县嘉会乡春秋墓葬，出土青铜器斧、凿、剑、钺、鼎等 33 件；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葬，出土铁器锛、斧、凿、刮刀、镢等 110 余件。此外，还有纺轮、瓮、壶等陶器，剑、箭簇等青铜器，都同中原出土各种文物相一致。

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广西地区就已大量地融入了中原文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广西春秋战国墓葬出土的工具、农具同中原地区使用的一样，从生产工具看，当时广西的生产水平与中原地区靠拢趋同。尤其是平乐银山战国墓出土的大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。

《文献通考·舆地考》。

《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》，载《文物》，1988（12）。

量铁器农具，说明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（至少是桂北地区）农业生产中已经大量使用铁器农具耕种，同战国时期中原农业生产水平也大体一致。而这些出土文物大都是本地制造的，这说明了广西地区手工业也发达达到一定的水平。手工业产品具有集中生产的特点，自然是通过交换才能到墓主人手中，由此推测商品经济在当时应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相当位置。

秦开凿灵渠，统一岭南之后，设立南海、桂林、象郡，这时，除了 50 万中原大军之外，还把大量的中原的汉民包括逃亡的罪人、赘婿、商人移入岭南，这几十万移民对广西地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。

秦王朝由于统治政策的失误，13 年（公元前 206 年）而败亡。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，龙川令赵佗，接受南海郡尉任嚣的临终嘱托，起兵攻并桂林、象郡，建立了割据岭南的政权南越国，统治岭南 93 年。

赵佗统治岭南这 93 年里，由于史书上记载十分简略，有关情况不十分清楚，尤其对经济发展、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更不甚了了。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记载 赵佗尊重岭南民族的习俗，并与岭南民族通婚，同岭南民族和睦相处，吸收岭南民族参与政权管理，从中原引进“金铁田器、马、牛、羊”以发展岭南地区的生产。在南越国 93 年统治中，除吕雉治汉的几年外，岭南都同汉王朝相安无事，社会稳定，生产得到发展。屈大均在《翁山文抄》中认为“岭南华风之开 实始赵佗”。^①这里所说的“华风”除了民间风气外 还应包括中原社会生产风气。

南越时期，由于社会稳定，生产得到相当发展，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窥见当时的情状。如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文物中，有一批相当精美的漆器，这些漆器花鸟人物图案，形象生动，水平很高，这些漆器均打有产地“布山”的戳记。布山县为秦开岭南三

^① 屈大均：《翁山文抄》卷二。

郡时所设县，在今广西贵港市境内，可见是当地产品。此外，在墓中及其他汉墓中还出土陶器、铜器等等，铜器中也有打上“布”字的，都说明了当时手工业的水平。最有意义的是南越王墓的发现，从墓中出土的文物看，可称为一个宝库，其中不少器物是南越国所造，水平之高，文物之精美，充分说明南越时期手工业生产水平达到了相当高度。^①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加之秦王朝发配商人到岭南，南越时期商品经济也得以发展，赵佗在各郡县设立“市官”，管理市场商品交易。对外除与汉王朝通贸易外，还与相邻的闽越、西南夷夜郎等有商品贸易往来，《汉书》即说“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”。^②

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平定了以吕嘉为首的南越叛乱之后，开始了对岭南的统治。汉武帝将秦时岭南三郡调整为九郡，其中郁林、苍梧、合浦郡及零陵郡部分县、牂牁郡部分县在今广西境内。两汉时期，除王莽主政到“新朝”时期对少数民族采取镇压措施之外，基本上沿袭赵佗南越国时“和集百越”的政策，所以生产得到发展。尤其是农业上大量使用铁器农具，使田地耕作技术得到提高。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一方木牍，记载了随葬的一批铁器农具，有锄、锛、铤等数百件，贺州莲塘汉墓还出土了犁铧。这说明当时广西广大地区已大量使用铁农具，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。养殖业也有很大进步，广西出土的汉墓中，常有猪、鸡、鸭、牛等陶制模型。汉代手工业也迅速得到发展，主要有漆器、冶铸、纺织、玉石制造、制陶、采珠等。这些都为大量出土文物所证明。^③一些汉代墓葬出土了汉代的钱币，有秦半

广州文管会等：《西汉南越王墓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91。

《汉书·西南夷南粤朝鲜传》。

参见《广西文物考古发掘报告集》及《广西地方志》2001年3期冼光位《西汉木牍（从器志）及其特点研究》。

两、汉五铢、王莽时的货泉等，^①货币的使用表明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广西地区在三国时属吴，然后属西晋、东晋，南朝时属刘宋、南齐、陈。虽然朝代更迭频繁，但广西地处岭南，兵燹不及，社会相对比较平静，因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。1980年在苍梧倒水乡发掘的南朝墓葬，出土了一件陶制耙田模型，一人赶两牛耙田，耙的使用说明生产工具的进步，用牛代替人力，更说明耕作技术大大的推进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中记有岭南“两熟之稻”，^②两季稻的耕种，粮食产量大大提高，岭南成为粮食富余的地方，为市场提供商品打下基础。手工业的进步也为市场提供了新的商品，如青瓷器的制造，从三国至南朝发掘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青瓷，烧制技术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。恭城县南朝墓出土的印花青瓷盘，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刘宋时“岭南尝献入筒中细布一端八丈”。^③这是苧麻织成的轻而薄的细布，一匹八丈可以放进竹筒里，可见纺织技术也相当精细了。此外，冶铸业比之前代也有大的进展。产品多了，商贸自然增多，史书多有记载。这个时候海外贸易也有较大的进展，合浦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之一。而与南海国家的交往，则是孙权派宣化（今南宁）从事朱应及中郎康泰前往打通的。^④广西的一些手工业品也通过海运与外国交易，如青瓷、铜器等。从外国输入的主要商品是香料、玛瑙、玳瑁等。对外贸易有了一定的规模。

广西虽地处边徼，但较早融入大一统的国家格局，政治、经济逐步与中原水平接近；即从商品经济来说也是这样。从周秦以来，随着社会分工、私有制的发展，农业、手工业的进步，商品

《平乐银山岭汉墓》，见《广西文物考古发掘报告集》 341页，南宁，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3。

② 《水经注》卷四十。

③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一九。

④ 《梁书·诸夷海南传》

市场得到发育，为日后商品经济发展奠定基础。而对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唐宋两代。

第一节 唐代广西的商品经济

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存在条件，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、劳动产品为不同的所有者占有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则要靠农业、副业、手工业的发展，才能有丰富市场的商品。隋唐时期，中原同广西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，咸通三年（862年）以后，又将岭南分成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，少数民族地区则实行羁縻制度，用少数民族首领任州府县官，此时广西已完全融入了多民族国家的格局里。

一、农业。广西地方官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。这些措施有：大力推广牛耕。如李昌夔平定西原少数民族起事之后，对20万参加起事的少数民族群众“给耕牛种粮，令还旧居”。^①韦丹任容州刺史时“教民耕织”。^②牛耕已遍及广西全境。兴修水利方面，先后有李渤、鱼孟威两次修浚灵渠；武则天时期在桂州城西南修相思埭运河，沟通桂江、柳江水系，灌溉农田；柳宗元在柳州掘井灌溉，敬超先在昭州挖井等等，也对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。开垦荒田也是当时一些地方官采取的发展农业的措施，柳州、容州都开垦了大量田地，促进了农业发展。粮食产量大大提高，史书上记载的岭南“千斛为货，亦不患其难也”。^③

① （唐）韩云卿：《平蛮碑》《粤西文载》卷四十五，南宁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0。

《旧唐书·韦丹传》。

《宋书·周朗传》。

也就是说，岭南一下子拿出千多担的商品粮食，也不会有困难，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是确实出现了。以至有些地方资料说：“粮粒丰储，纵有十载无收……人无菜色”。^① 粮食在古代是大宗商品之一，广西除了一般的稻谷之外，还有黑黍、火米等粮食作物。^② 唐代广西主要经济作物还有茶、麻。容州刺史韦丹教容州老百姓种茶；其他州县也发展植茶，在一些有关茶的著述中，写到了象州、容州、邕州等地产茶。^③ 茶在唐代是十分重要的饮品，正如李珣所说：“茶为食物，无异米盐，人之所资，远近同俗”。^④ 这种饮茶习惯遍布唐代全国。广西由于自然条件适合种茶，所以茶业发展很快，到中唐以后，就成为比较重要的茶产区了。麻、桑、蚕在广西也是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。唐以前广西就开始种桑养蚕，历史上所说的岭南“八蚕”应是有根据的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南越“女子桑蚕织绩”，今广西考古发掘发现汉代丝绸残迹。^⑤ 到了唐代，种桑养蚕就又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中唐诗人张籍《送严大夫之桂州》一诗，写桂州的情景：“有地多生桂，无时不养蚕。”^⑥ 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。可见当时在广西养蚕相当普遍。麻类特别是苧麻在广西地区很早就种植，所以宋初就已经是“广西触处有苧麻”了。

二、手工业。唐代广西的手工业在前代基础上多方面得到发展。首先是纺织业。唐代广西纺织业有麻纺织和棉纺织。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名诗《新制布裘》写道：“桂布白似雪，吴绵软如云。

《上林县志》附录《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》，又见《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》。

李德裕：《过鬼门关》《全唐诗外编》下，468页，又见《粤西诗载》卷13。曹邺《田家效陶》，《全唐诗》卷593，北京，中华书局。

③（唐）陆羽：《茶经》：“岭南（茶）注福州、建州、韶州、象州”。

《旧唐书·李珣传》。

1994年考古《贵港罗泊湾汉墓发掘报告》，见《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》北京，文物出版社1988。

⑥（唐）张籍：《张籍诗集》卷二，中华书局，1959。

①

②

10

氍毹”，

③

（全唐诗》卷四二四，四三五。

②（唐 撰者阙名，《玉泉子》。中华书局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 1991。

参见拙文《唐宋广西纺织品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广西地方志》

当时广西少数民族产的班布（又写作斑布），做工精细，是当时人喜爱的衣料。根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，富州每年进贡班布，元和后定额进“斑布五匹”。^①这种班布在宋代仍生产。《岭外代答》“瑶班布”条记曰：“瑶人以蓝，染布为斑，其纹极细，其法以木板二片，镂成细花，用以夹布，而熔蜡灌入镂中，而后乃释板取布，投诸蓝中。布即受蓝，则煮布去其蜡，故能受成极细斑花，炳然可观。”^②正因为班布十分精美，所以列为贡品。

《唐六典》记岭南道“赋蕉、芭、落麻”。这里的蕉是蕉麻，应是麻的一类而不是芭蕉的蕉，芭蕉类的纤维没有韧性，是不可以作布的。我国种麻织布的历史非常久远了，《诗经·东门》就吟咏了沤麻的现实生活。苧麻发展后，重心转移到江南，汉以来越布就闻名天下。岭南的麻布生产工艺十分精细，上引《资治通鉴》所记南朝刘宋时代岭南所献装入竹筒的细布，就是当时岭南的苧麻布。这种精细的苧麻布，因为太费工，属于奢侈品，宋武帝曾告诫岭南不要生产这种麻布，但岭南一直是生产着的。苧麻是广西的优势，当时苧布产量和技术都达到相当水平，《唐六典》记载：“邕州贡银，赋纁、布。”^③“纁”即是苧麻布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贵州、宾州等地也贡纁、布。所以北宋初年广西转运使陈尧叟上书朝廷在广西大量种植苧麻。

陶瓷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，陶器的生产十分古老，从上古时代就开始使用，大量出土的陶器证明了中华民族悠久的用陶历史；广西众多的出土墓葬和遗址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制陶手工业越来越发展，苍梧倒水乡发掘的南朝墓中出土的陶制耙田模型，牛、耙、人俑都做得很不错，而且上有黄釉。广西近年出土

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七。

②（宋）周去非：《岭外代答》卷六。

③《唐六典》卷三，户部尚书，西北大学历史系，日本广池学园事业部出版，复印本。

唐代的陶、瓷器颇多，而且技术颇精良。如 1977 年钦州发掘隋唐墓葬中出土的陶瓷器数量很多。单是青瓷器就有 53 件，做工比较精细，釉较厚润，青色微微泛黄，有些青中微显绛红色。其中有青瓷碗、碟、瓶、提梁壶、唾壶等陶器也不少。^①又如 1985 年 2 月发掘的全州唐墓出土的青瓷器，器形规整，胎质细腻，烧造火候很高，器物的釉彩虽然埋藏地下千余年，但釉色仍具有玻璃质的光泽。^②根据出土墓砖记载，这个墓墓主为赵姓永州司仓参军，下葬日期为贞观十二年六月二十日。可见贞观年间广西的瓷器虽比不上中原地区的精美，但烧制技术已颇良好。据现代的考古发掘，北流河下游西江左岸藤县雅窑村就发现了晚唐至五代的窑址。^③唐代广西的陶瓷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
冶铸业在唐代也取得很大的进展。唐代广西的冶铸业有铜铸、铁铸。铜铸有铜鼓、日用铜器、钱币等，钱币铸造留待下节再述。铜鼓铸造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悠久的历史，在田东发现的战国墓葬中就有铜鼓一件。^④及后出土了从汉至隋大量的铜鼓，分布于西林、贵县、桂平、北流、陆川等地。^⑤铜鼓是少数民族生活中重要的器具，广西的铜鼓铸造绵延不绝。在北流铜石岭发现了汉代冶铜遗址。这个冶铜的遗址是从矿石冶炼成铜锭的工场，从所挖掘出土的工场使用器具的年代来看，瓷陶器具所属年代绵延久远，从汉至隋唐都有，可见这处冶铜遗址使用年代比较长久。^⑥这一冶铸遗址的发现，证明了广西冶铸业的历史悠久，到

① 《广西钦州隋唐墓》载《考古》1984（3），又见《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》，南宁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3。

② 《广西全州县发现纪年唐墓》，载《考古》，1987（3），又见《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》南宁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3。

③ 《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》193页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1984。

④ 《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葬》，载《考古》，1979（6）。

⑤ 参见《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》。

⑥ 《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》载《考古》，1985（5）。

汉代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冶铸工场，到唐代还在生产。唐代在贺州临贺县也有冶铜，“临贺，东有铜冶，在桔山”。^① 广西产铜，这是铜铸业、打制手工业得到发展的条件。今出土的铜器，除铜鼓外，铜镜的生产也达到较高的水平。1976年恭城栗木出土的莲花纹铜镜，内缘装饰有六朵莲花，周边有精细壮锦花纹图案，外缘为24字铭文：“洞心照胆，知幽察微。珠惭朗润，月谢光辉。妖兵既弭，福庆斯归。”据“妖兵既弭”看，应是中唐后期所作。1972年北海高德镇出土的鸾凤瑞兽纹铜镜，八曲菱花形，背饰鸾凤瑞兽浮雕十分精细优美；1973年藤县三合村出土方形海兽葡萄纹铜镜，浮雕海兽葡萄，生动可爱。这些铜镜至今镜面光亮，照影十分清晰，充分反映了唐代广西铜镜制造工艺的精良。^② 正因为如此，朝廷规定了桂州进贡铜镜、铜器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“（桂州）贡赋 开元贡铜镜四十四面 元和贡银一百两”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桂州……土贡 银、铜器……”据考古发掘陕西1980年在蓝田出土唐代金银器中有银盘盘底刻有“桂管臣李杆进”，则桂管除贡银铤之外，还进贡银器。这都说明当时广西铜器、银器制造工艺已达到较高水平。广西唐时有铁矿，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：“桂岭县……桂岭在县东十五里，程冈，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，朝冈在县东北四十五里，并有铁矿，自隋至今采取。”铁铸造业主要是制造农具。铁器农具的大量制造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广西的锡产量在唐代也有相当规模，其中以贺州为多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临贺县……县北四十里有大山，山有东游、龙中二冶，百姓采沙烧锡以取利焉。”^⑤ 该书又载贺州冯乘县有

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上 《地理志》

见《广西出土文物》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。

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七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七

冶锡场“(冯乘县)萌渚峤在县北一百三十里。即五岭之第四岭也，按今县与道州江华县分界于此。峤之上，锡冶三。”^①由此看来，广西的锡产量还比较大，贺州有民间开采也有官办的冶锡场，使得锡成为广西传统的矿冶行业，为明代广西的锡冶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此外，广西的藤州、贵州还产铅，贵州以铅器为贡品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：“贵州怀泽郡，土贡金、银、铅器、纁布。”可见广西的铅器制作亦颇精良。唐代广西的冶铸五金打造手工业得到明显的进步。

从史书记载可见广西的矿冶业中，金银冶炼似亦有相当规模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记广西贡物中多有贡金者，但只记有融州金二两，蒙州麸金十两，钦州贡金三处。所载恐不全。^②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记，邕州、澄州、宾州、贵州等州均有贡金，并记邕州“有金坑”^③《岭表录异》有云：“五岭内富州、宾州、澄州江溪间皆产金。侧近居人以淘金为业。”又曰：“澄州金最良。某顷年使上国，亲友附澄金二十两，讶其单鲜。友曰：金虽少，贵其夜明，有异于常金耳。留宿验之，信然。”^④居民能“以淘金为业”，产量最少要能使居民维持生计，否则人们是不会以之为业的。德宗年间下诏书曰：“邕州所奉金坑，诚为国润……其金坑宜委康泽，差择清强官专勾当，任贫下百姓采鬻，不得令酋豪及官吏影占侵扰，闻奏当重科贬。”^⑤由此观之，则应该是较大的金矿，根据唐王朝土贡的惯例，所贡必须是所产，则唐代广西产金，并有金的冶铸业，否则是不可能要各州贡金的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所载：桂州元和贡银一百两，贺州元和

①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七，今校点本标点不同。

②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三十八。

③ 见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上《地理志》。

④ (唐)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上。南宁，广西人民出版社《岭表录异校补》本1988。

唐德宗《罢邕府金坑敕》，《全唐文》卷五四。

贡三十两，昭州开元贡三十两，元和贡二十两，象州开元、元和均二十两，柳州开元、元和均二十两，龚州开元二十两，思唐州开元十两，宾州、澄州、横州、钦州均开元贡银。根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所载，土贡银的州还更多，如邕州、澄州、横州、潯州、峦州、梧州、蒙州、严州、思唐州、白州、党州、宾州，义州等都是。在西安出土的银铤中有实物可以证明。1956年西安市郊第一砖瓦厂厂址出土刻有“朗宁郡都督府天宝二年贡银壹铤，重伍拾两”朗宁郡即邕州，证明了邕州确系贡银；1962年陕西蓝田县康庄出土正面刻有“容管经略使进奉广明元年贺冬银壹铤，重二十两”，这是容管经略使给朝廷冬至节的贺银。可见史书所记广西各州进贡银是有根据的。由广西贡银的情况可以推知，当时广西在比较广阔的地域里开采银矿，并冶铸银铤，银冶铸业比较发达。

农业、手工业的长足发展，为市场提供了商品，使市场商品更加丰富。

三、唐代广西的城市与墟市。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是与市场互为条件的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：“商品依赖于城市的发展，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”^①马克思这里深刻地指出商品与城市的关系。唐代商业繁荣，出现了扬州、益州那样的特大商业城市，长安、洛阳那样的政治、经济中心城市。广西地处岭南，商业发展比较后进，但随着岭南商品经济的兴起，岭南大都市广州的繁华带动了广西的城市和墟市的发展，也出现了一些商业繁茂的城市，尤其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墟市，更是星罗棋布于广袤的乡村之间，城市与圩市都促进了商品的流通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桂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正如唐代诗人任华所说：“桂林，秦所置郡也。南临天池，东枕沧溟，西驰牂牁，北走洞庭……实

五府一都会也。”白居易也说：“桂林秦郡也，东控海岭，右扼蛮荒。”“地连五岭，川束三江，真千里之奥区，杂华夷之阜壤。”^③或说“东制邕容交广之冲，南扼宾峦严象之隘”又曰：“湘水之南，粤壤之西，是为桂林。秦以郡置，唐以管分……二十有六州，巍然为会府。”^④就岭南而言，桂林是开风气之先的地区，很早就发展成为“西南一都会”。经济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桂林城是唐代李靖任桂州都督时建筑的，“子城，在漓江西，周三里十八步，高一丈二尺。”^⑤“外城，周三十里，高三丈二尺，唐蔡袭筑”；夹城，在外城之北，周六七里，唐光启中都督陈环筑。独秀峰及今谓桂岭皆在此城之中。廛市亦盛，大略包山并江以为固。”^⑥从初唐建城，几经扩建、增建，桂林在唐代已经是商业繁盛的城市了。桂林是岭南的门户，岭北、岭南商品交汇的处所。前人所说“桂林为广右二十五州之都会，风俗淳古，分野宁固，自秦汉来，无干戈之患，和气所熏，山川秀发。”^⑦这些对桂林的描写是符合事实的，桂林在唐代时已是岭南与岭北交通和商业相连接的都市。唐代王浚、李渤、鱼孟威相继多次修灵渠，保证了长江水系经湘江南下珠江的交通。武则天时，又在桂林南面三十里处修相思埭运河，沟通桂江、柳江，更进一步发展了交通。贞观年间侯弘仁开辟著名的牂牁道“出邕州，以通交、桂”。^⑧使桂林与黔、滇的交流更加方便。

梧州也是唐代广西商业较发达的城市。南越王赵佗任命其弟

任华：《桂林送前使苏侍郎归上都序》，见《粤西文载》卷四十七。文中所谓“五府”指桂管、容管、邕管、交管、广管经略使府。

白居易：《严谏知桂林制》，见《全唐文》。又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二。

崔巖：《授郑亚桂府观察使制》《全唐文》卷126，又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二。

（宋）李彦弼《八桂堂记》，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三十。

见《桂林风土记》。

⑥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1403卷《桂林府部汇考五》引明《桂林府志》。

⑦ （宋）张仲宇：《桂林盛事记》《粤西文载》卷三十六。

⑧ 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五。

赵光为苍梧王，筑苍梧城。城周长 424 米，面积 1.12 万平方米。^①这是梧州建城之始。由于史禄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，梧州正处于两大水系要冲。经漓江北上过湘江入长江，上达中原及江南；由西江东下直达广州，沿西江西上到贵州、郁州、邕州，沿牂牁道通黔滇。秦王朝又开辟了桂林经梧州到广州的驿道，对发展交通、发展经济也很有作用。重要的交通位置使梧州很早就成为“两粤一都会”。汉代设交趾刺史部及交州，州治在此；唐代正式设梧州，下辖五县，所以梧州又是历史悠久的政治、经济中心，促使其商业的繁荣。所谓“历汉唐至宋，号为名郡”就是指这种情况。唐代武德年间，梧州城规模大大扩展，周长 880 米，面积 4.84 万平方米，^③比南越时扩展了三倍多，这是梧州经济发展的需要。及至中唐时期，少数民族起事部队占据容管经略使所治大部分地区，容管经略使寄治梧州颇长时间，行旅商人亦集中于梧州，更促进了梧州作为商业城市的发展。

除桂林、梧州之外，邕州也是一个政治、经济的中心，有城有市的都会。邕州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，唐人崔远谓：“乃阨邕部，实惟旧藩。接服岭之要冲，连骆越之奥壤。”^④或说：“海滨而南，邕为重地。”^⑤又有说“海滨巨屏，境接于诸蛮。”^⑥邕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就成为岭南西部的政治、经济中心。唐代分岭南为五管时，邕州是邕管经略使使府，邕州一直设邕州节度使。到了咸通三年（862 年）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、岭南西道时，邕州为岭南西道治所。邕州早有城池，据刘恂《岭表录异》

《梧州市志》，南宁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。

②（明）《重修苍梧府志序》，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五十三。

据《梧州市志》。

崔远：《授李邕州节度使制》，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二。

王堂：《授蔡京岭西道节度使制》，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二。

⑥ 陆扈：《授滕从克邕州节度使制》，见《全唐文》卷二二七，“克”作免。又见《粤西文载》卷二。

云：“刺竹，其竹枝上刺，南人呼刺为勒……，其笋丛生，转复牢密，邕州旧以为城，蛮蛋来侵，竟不能入。”唐以前邕州曾植茂密的箬竹为城墙，是很奇特的。①竹在广西多有，《桂海虞衡志》记曰：“箬竹，刺竹也。芒棘森然。”这种竹的刺既粗又硬又密，长成一丛一排，确实不易进入。古代用刀枪要攻进这样的城墙是很难的。以箬竹为城墙是比较久远的事了。蛋蛮又作蛋、旦等，可能系指卢循起事失败后余党入海为寇，曾袭邕州，则应是东晋到隋的事。

由于邕州是邕管经略使府、岭南西道使府所在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是交通要冲，联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及滇黔交趾的地区，所以很早就是一个商业城市。而且在它的周围还有不少商业墟市，如石溪、太平、横山、下雷、左江镇等，都是野市之属，少数民族都在这些地方进行商品交换。这些野市围拱在邕州周围，使得邕州就自然形成一个商业中心城市。在唐代，邕州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。

此外，合浦的珠市则是珍珠的专业市场，还是海外贸易的港口城市。作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，当时除珍珠贸易外，商业繁荣，是广西南部商业城市。

至于唐代广西的墟市，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下，已有了较大的进展，数量不少的墟市星罗棋布于幅员广阔的农村交通要津之间，成为商品贸易的市场。柳宗元在柳州观察墟市后，写了著名的《柳州峒氓》一诗：

郡城南下接通津，异服殊音不可亲。
青箬裹盐归峒客，绿荷包饭趁圩人。
鹅毛御腊缝山罽，鸡骨占年拜水神。
愁向公庭问重译，欲投章甫作文身。

柳宗元在柳州对这个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之情，对墟市的情景作了简朴的描绘。居住在峒中的少数民族在墟市的日子到柳州来趁墟。看来柳州当时是有墟日的，所以才有趁墟人的描写。

比柳宗元略早的诗人王建有《南中》一诗也写广西的墟市：

天南多鸟声，州县半无城。

野市依蛮姓，山村逐水名。

唐代广西的一些州县没有筑城，但是这些州县已经有不少“野市”，所谓“野市”亦即墟市。广西的墟市有时称为“僚市”。唐人刘恂曾任广州司马，卸任后留在南海郡居住，到过岭南许多地方，所以《岭表录异》记录了广西及岭南地区许多真实的生活情况，其中有不少广西地区的商品贸易的史实。《岭表录异》“僚市”一节谓：“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，至今谓之僚市。”僚、蛮、夷系唐人对岭南一带少数民族的泛称。“蛮市”“僚市”是因为墟市上有不少少数民族老百姓来趁墟，所以有此称呼。石溪口即邕州都督府所管辖的石西州，唐时为羁縻州。石溪口在今广西宁明县，当时是比较大的墟市，可见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已经形成了比较繁华的墟市。

广西地处南方，气候宜人，唐代已经出现了夜市。现实主义诗人张籍曾到过广西，对广西情况比较了解，写了近十首反映广西地区的诗。他对广西的“夜市”印象十分深刻，两次提到了广西“夜市”：“夜市连铜柱，巢居属象州。”“蛮声喧夜市，海色浸潮台。”^①可见，广西的夜市是比较热闹的，反映出广西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。

唐代广西市场上的商品也很丰富，除了农业、手工业、矿冶业的产品之外，一些土特产品在市场上种类繁多。其中有化妆品：“白土坑，在富州城北隅。其土白腻，郡人取以为货，终古不竭。今五岭妇女，率皆用之为粉，又名铅粉。”^②鲜花：“岭表朱槿花……俚女亦采而鬻，一钱售数十朵。若微此花，红妆无以

分别见《送南客》 《送郑尚书出镇南海》，见《张籍诗集》卷二、卷三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。

刘恂：《岭表录异》卷上。

姿其色。^① 海鲜：“黄腊鱼，即江湖之横鱼……市此鱼而食之”
“石头鱼……多市鱼之小者”“南人多买虾之细者……谓之‘虾生’，郡鄙俚重之，以为异馐也。”“蚝，即牡蛎也。……挑取其肉，贮以小竹筐，赴墟市以易酒。”“彭……多以异盐藏，货于市。”土特产：“蛤蚧……俚人采之，鬻于市为药，能治肺疾。”
“山龟之巨者……乡人采之，取壳以货……以为梳蓖杯器之属，状甚明媚。”“庞蜂，……采得者鲜矣，人以善价求之以为药。”
“岭南蚁类极多……有席袋贮蚁子巢鬻于市者……人竞买之，以养柑子也。”“红飞鼠……南中妇人，皆买而带之，以为媚药”。
“岭表所产犀牛……（皮）堪为腰带。千百犀中，或遇有通者……黑白分明，花点差奇，则价计巨万，乃希世之宝也。”甚至特异的鸟类、野生动植物也是商品：“梟……桂林人罗取生鬻之，家家养使捕鼠，以为胜狸。”“南土多野鹿藤，苗有大于鸡子者，细于箸，采为山货，流布海内。”^② 由此可见唐代广西市场商品五花八门，十分丰富。

此外，唐代广西市场上的大宗商品还有盐。《岭表录异》记曰：“野煎盐，广南煮海其无限，商人纳榷，计价极微。”所谓野煎盐，实即私盐。唐代盐政大多时候是实行国家专卖，食盐经营多由政府加以控制；但私盐在一些僻远地方依然存在，所谓“煎贩之徒，无由止绝”^③ 就是指这种情况。代宗时刘晏改官营官运为官营商运，商人参与盐的经营后，盐业经营更其活跃。梧州、邕州等地逐步成为食盐的转运地。刘晏还在岭南设常平仓。“江岭去盐运者，有常平盐，每商人不至，则减价以糴民”。^④ 盐的销售量很大。

刘恂：《岭表录异》卷中。

刘恂：《岭表录异》。

《册府元龟》卷494。

《新唐书·食货志四》。